

· 人物研究 ·

“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

李 孝 迁

〔摘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史学方面讯息，相当长时期里，在中共党内具有特殊地位，代表中共官方说法，具有很大的力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简编》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站在中共立场，颠覆既往旧史“成王败寇”的叙事模式，不仅在史学史上具有革命意义，而且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历史书写以一时政治为转移，政治诉求凌驾于历史解释，严重伤害了史学独立性。延安版在解放区颇有流传，但在国统区影响有限。此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始于新知版，进而波及海外。进入后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简编》已全然脱离当下社会现实，这使它逐步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关键词〕范文澜；毛泽东；中国通史简编；中共史学

〔中图分类号〕K03；K0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8)-11-0101-19

Red Historiography: A New Discussion on Fan Wenlan's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Li Xiaoqian

Abstract: The book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ritten by Fan Wenlan contains rich information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history. For a long time, the book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based on an official statement by the CPC, it was extremely powerful in shaping the memories of Chinese history on several generations. This book had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real politics, putting itself in the position of the CPC and subverting the narrative mode in old history books that indicated that winners could take all while losers were always in the wrong. This had not only a revolutionary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an important political meaning in CPC history. However, the writing of history had to be changed when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changed and when political demands dominated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which damage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tory. The Yan'an edition of the book gained popularity in the liberated areas while it had limited influence in the KMT-controlled areas. The Xinzhi edition began to receive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first from all social sectors, and then worldwide. After entering the post-revolution era, this book, taking class struggle as its outline, is totally alienated from reality in current society and thus it has gradually been forgotten.

对于年轻一代的读书人来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或是一部相当陌生的史书，但从1949年前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此书订正本和修订本是许多读书人获取中国历史知识最为流行的读本^①，影响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范文澜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之一，先行研究不算丰富。就《简编》来说，以往学界讲成书背景，一般说是整风运动前毛泽东授意编写的，这固然没错，但没有追问毛泽东为什么想要一部中国通史，

与国民党有何关系，有何更宽广的学术关怀面；过去谈得较多的是《简编》的学术成就，对范文澜为何把中国历史写成如此面相，着墨不多；过去不甚注意《简编》前后版本的差异，使用

^{*} 本文是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900—1949）”（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大年说，《简编》修订本“累计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成了我们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参见《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32页。

混乱；订正本做了哪些改动，基于何种考虑，过去讨论得很少。《简编》出版之后，党内外学界有何看法，英文世界是否有所评论，这方面有待进一步发掘；一般都说《简编》发行量如何大、影响如何深远，但提供的事实很少，需要进一步钩沉史实加以说明。

一、成书背景

《简编》初版于1941年，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毛泽东对此评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①今人仍可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毛泽东的激动之情。只有把《简编》安置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思潮和政治诉求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合理解释《简编》何以产生、以何种面目出现以及毛泽东的兴奋之由。历史背景包括客观主义（新历史考据学派）与唯物史观（中共史学）的长期斗争、中共史家与国际左派史学相互纠葛、党内史学界对不同观点的分歧等学术面，以及抗日战争、各种政治势力争夺历史解释权、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看法等政治面。4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各种事件、活动与言论，构成了本文解读《简编》的历史线索，也是《简编》成书的基本观照面。

在中国现代史学的众声喧哗中，有两种强音最为显著：一派是强调客观、实证的专题化研究取向，或称新历史考据学派，如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垣、洪业等为代表的史家共同体；另一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共史家，强调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两派从30年代以来就在史学领域展开激烈斗争。关于前一派学术工作，历史学家丁则良说“从五四到抗战开始这二十年中，全国的学术界可以说完全埋头在这分析的工作中，大家误解历史，误解史学，以为就是考据，就是校勘。而于我们历史的大貌、文化的轮廓，反没有人能说得清楚。”^②此种学风产生了两方面的负面结果。

其一，通史作品始终没有取得良好成绩，一般读者普遍感受无良史可读。“多少年来，大家都希望有一部好的中国通史出版……在战前就有缪凤林先生的《中国通史纲要》、章铤的《中华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金兆丰的《中国通史》，抗战以来出版的，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陈恭禄的《中国史》、周谷城的《中国通史》等，然而这些书都是供大学生做教本用的，学院式的严肃气味使一般读者不敢去接触它们。”^③其二，学院史家的知识生产，不论专题研究还是通史写作，多以学为学，与人生、社会现实严重脱节。为学术而学术的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在承平之世，或不会受到指责，但在国破家亡的时代，社会对学术有更多期待，难免成为众矢之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舆论界对当时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提出严厉批评：中央研究院究竟不是私人或私立的研究机关，而是动用着国库、直隶国民政府的国立研究机关，既然如此，一切的研究计划应该基于国家民族的立场，配合当前的国策，不能仅凭一己或私人的偏好；专门研究固然很重要，但学术通俗化的重要性或不亚于专门研究。一篇评论研究院之使命的社论特别指出“闻共匪所设立的伪中央研究院有基于所谓马列主义的中国通史之编印，为什么中华民国的中央研究院不能依据宪法，有基于三民主义的中国通史之纂辑？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在专门研究方面确已极有贡献，但在学术的通俗化方面，特别是在如何配合我们的国策方面，似犹嫌未足。”^④可见，“马列主义的中国通史”跟“三民主义的中国通史”存在角胜关系。顾颉刚对此反思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

① 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84页。

② 丁则良《中国史学之新趋势》，《大国民报》（昆明）1943年4月21日。

③ 苏诚鉴《评〈中国史纲〉上册》，《文史教学季刊》1942年第6期。

④ 社论《中央研究院的使命》，《申报》1947年10月16日。

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① 中国社会各界“受时代之刺戟，思建立民族主义之基础，群欲得一中国通史而读之，而苦于无其书”^②，国民政府教育部亦有征求历史课本启事^③，然合乎大众阅读的中国通史却迟迟未能问世，这无疑给中共史家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40年代中共史家著作大量出版，且广受社会欢迎，学院史家压力剧增，一改过去不屑回应的态度，如童书业、缪凤林等开始公开批评左派史学。

国际左派的中国史研究是《简编》成书的另一个学术背景。由于立场和研究方法的根本差异，中共学者多不能认可国内学院派史家的成绩，对于他们出版的各种通史以否定为主调^④。与此相反，他们颇为欣赏苏联、日本左派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论著，积极译介其作品^⑤。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刘亚生说：“我们过去所依赖的科学中国通史书籍，只是外国人替我们写的几本社会史。一本是苏联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另外二本日本人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因为中国闹着历史书籍的饥荒，所以这几本书就称起‘霸’来了。在中国广大的学生圈里传诵着，其无形中将发生很大的影响与作用是可想而知的。”^⑥然而，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强调研究历史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此后中共史学发展取向产生了关键性的指引作用，“被全国唯物史观历史学者们所热烈地响应着，他们分头从事于历史各部门的工作”^⑦。原先被予以肯定的国际左派中国史著作，此时却被轻易否定，“外国作品被介绍过来的虽有几种，但并不能适用”^⑧。

中共需要一部用唯物史观正确把握的中国史。国际左派中国史既被抛弃，那么中共史家就必须承担这项使命。有延安学者指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底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的历史，把它从统治阶级的换朝易代的历史，变成真正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公民史。著出一本科学的教科书，用以教育中华民族的后辈，激动我国青年

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的热情。这一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历史学家不能完成，历史注定了要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来完成这一任务。”^⑨以范文澜为首的延安史家此时已开启《简编》写作计划。叶蠼生在《简编》上册刚出版不久时，一方面批评外人所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历史教程》诸书之不当，另一方面积极向历史学习者推荐《简编》，认为“用新史观来编写整个中国的通史，还是仅此一部，不妨用来充饥”^⑩。同样，金灿然于《简编》上册出版三个月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在过去，苏联及中国的新的史学家往往走了捷径，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把社会发展的公式代替具体历史材料的摄取，其恶果便是：使读者只领会了一般的社会史的轮廓，而得不到真实的历史知识。《通史简编》的编者便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将他们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用大量的具体的历史材料给以表现。在全书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特意解释自己的观点的地方，然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却到处被上述的观点贯穿着。将观点、方法藏在材料的隐避物内，所写出的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而不是架空的社会发展的公式。”^⑪需要指出的是，

- ① 《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页。
- ② 顾颉刚《中华百史的发轫》，《申报》1934年10月21日。
- ③ 《教育部征求高初中本国史地课本》，《抗建》1942年第4卷第16期。
- ④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3页。
- ⑤ 参见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85—196页。
- ⑥ 刘亚生《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解放日报》1942年1月17日。
- ⑦ 叶蠼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84页。
- ⑧ 叶蠼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1941年7月31日。
- ⑨ 杨松《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5期。
- ⑩ 叶蠼生《对于学习中国历史的几点意见》，《解放》第133期，1941年7月31日。
- ⑪ 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叶蠖生、金灿然作为《简编》的编写组成员，其论绝非无的放矢，至少说明国际左派中国史是他们构思写作的参照面。

范文澜一再强调“延安马列学院的资料室参考材料不算多，那时要找《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同时我的历史知识很贫乏，许多部门根本不懂或懂得太少，如少数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部门，我都是门外汉，因之，有的说不出来，有的说得肤浅不扼要。”^①在参考资料如此匮乏的条件下，仅用一年半时间完成“无中生有”的开创性作品，如果毫无凭借，这“大胆的尝试”能成功几乎不可想象。当年延安的图书资料确实非常稀缺，但像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沙发诺夫《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中国经济史》、佐野袈裟美《中国历史教程》诸书中译本在延安都能找得到，否则叶蠖生、刘亚生等延安学者便不太可能对上述诸书有所评论。

国际左派中国史著作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虽遭批判，但对延安中共史学发展仍具积极意义，诚如吕振羽所云“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经济史》，虽然都能给予中国社会史研究部门以不少的影响与贡献，然而都未能获得相对正确的决定意义，同时也可说是相对的失败了。自然，这又是一部较正确的中国社会通史产生前之必然而又必要的经过，而且它必需要建筑在这些既有的成果之上的。”^②当时延安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加之《简编》又是通史体裁，所以它没有公开引用这些外人著作，国际左派史学的影响似乎是“绝迹”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编写组成员对外人著作毫无认识，在《简编》写作期间，范文澜领导的中国历史研究会成员金灿然、叶蠖生、刘亚生先后发表文章，批评国外各种史学观点。可以大胆推测，这应是精心安排的结果。《简编》没有注释，不引证今人观点，它的任务不像叶蠖生、刘亚生那样以辩论式的叙述引述、质问、肯定或驳斥流行于国内外史学界形形色

色的观点，而是将观点隐藏在事实里，通过重新选排史实，采取直述方式，表达对国史的看法，以回驳各种中共不认可的史学观点，譬如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停滞论、外族侵入促成中国进步等谬论。

抗战不仅是中国民族生存史上一个新界标，更是中国学术新生命的一个起点^③。九一八事变之后，写作中国通史之呼声，闻之弥久^④。1940年，张荫麟说“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⑤乱世多史，抗战不仅推动学院派通史著作大量出现，而且促进中共史学发展，“唯物史观学派则随着抗战的前进而不断的发展着，从过去仅仅从事理论争论走上对中国历史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的道路，而同时反投降的理论斗争也要求他们更多的努力”^⑥。抗战语境是解读《简编》的关键之一。

每当中国社会处于重大转折时期，历史知识的价值就会被凸显，因为人们需要通过了解过往而认识现在，从中获得行动方向的指示。然而，国统区史地教育之失败，成为时人的普遍共识^⑦。1938年8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出席中央训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典礼，发表《革命的教育》训词，特别强调“历史、地理的教育为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要求对这两门

①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② 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4卷第3期。

③ 丁则良《中国史学之新趋势》，《大公报》（昆明）1943年4月21日。

④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3页。

⑤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重庆青年书店，1941年，第1页。

⑥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83页。

⑦ Li Xiaolian, “Predicament and responses: Discussions of history educ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50, No. 2 (Spring 2017), pp. 155 – 166.

科目广搜材料,充实内容,精编教本,详细讲解,同时提倡课外研究,随时供给补充教材,“使各级学生和国民对于我们国家的过去和现在都有明确的认识,对于我们国家的将来都有坚决的自信”^①。教育部遵奉蒋介石训示,于1939年4月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即有奖励史地研究、加强史学教育等提案。1940年2月9日,教育部通飭所属各学校,“我国国际地位现既因持久抗战而日益增高,关于固有文化尤应特予阐发,以增强民族意识,而促进建国大业。本部除计划进行编纂中国史学丛书,整理古代经籍,暨筹设中国文化研究馆外,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应本发扬吾国固有文化之旨”,要求“各院校对于部颁科目表中之中国通史、断代史及各种专史,应特加重视,广收材料,以充实教学内容”^②。此举引起社会各界热议。1940年4月,教育部特设置史地教育委员会,规划全国史地教育。9月,公布修正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纠正以往重知识轻伦理的倾向,以便更好体现民族主义的史地教育,配合抗战建国的需要。各职业学校加授史地二科,各科每周讲授两小时,在第一、二两学年内讲授完毕,使学生对国家民族有更深切之了解,以增进其爱国心。^③凡此种种,无非欲借国史知识,以增强国民的民族意识。

而中共对中国固有文化包括国史知识的取舍评判则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就在蒋介石《革命的教育》发表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强调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继承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④此后,毛泽东多次批评党内学习历史的空气不浓,号召全党认真学

习历史^⑤。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民间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⑥当国民党提出发扬固有文化时,中共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显然有别于国民党,“对古代文化的清理,应汰其腐而存其精,发扬提炼民族优良传统,消灭渣滓和含有毒素的东西……说到整理编纂古代书籍,决不是拿几个远代骷髅,替它穿上一套时装,就以之摇来幌去自鸣得意”^⑦。如果只有“理”而没有“事”,是不足以服人的,因之中共急需一部寓理于事的中国通史,以便广大读者接受其观点。所以,当范文澜于1940年来到延安,正值延安即将开展整风运动,中宣部便要他编写一本十几万字的中国通史,为干部补习之用。在延安的各军政干部对中国历史相对漠视,也没有合适历史书可读,很不利于政治斗争。总之,“国史”几乎被国共两党在同一时间发现价值,这不是简单的普及历史知识之举,而是对往昔历史的不同解释,会深刻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叶蠼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详述抗战以来各种政治势力在史学领域的斗争,颇能反映《简编》成书的政治背景。

《简编》之前,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已发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中国

① 蒋中正《革命的教育》,《中央周刊》1938年第1卷第13期。

② 《教部通令各院校阐扬我国固有文化》,《教育通讯》1940年第3卷第7期。

③ 《教育部征求高初中本国历史地理课本办法》,教育部1941年10月印发,第18—38页。

④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7、798、801页。

⑥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第98—99期合刊,1940年2月20日。

⑦ 《孔子诞辰与教师节》,《新华日报》1940年8月27日。

社会”分为“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三节，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加以理论概括，大体为《简编》立下基本的解释框架，诚如叶蠖生所言“关于历史科学方法中国化方面，在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有了很好的成就。全国各前进杂志刊物时常登载前进学者们的作品，毛泽东同志的每句指示被引作研究的根据。”^①《简编》代表延安声音，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看法的“文本化”，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学院派对国史解释的垄断权，取代了国际左派的中国史作品，使后者逐步失去了接受者，很大程度上统一了中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为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起到了配合作用。《简编》由于具有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如此重视它，认为是“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

二、文本分析

《简编》上册自上古写至五代，中册写至鸦片战争，二者先后于1941年9月、1942年12月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上册卷首附序，署名“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者七人，即范文澜、谢华、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说“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下册。”^②所以，这部书最初虽集体起草，但最后由范文澜一人改写完成，后来署他一人名字，当之无愧。

延安版发行之后，各地解放区多有翻印，上海希望书店、新知书店、新中国书店以及三联书店等都据延安版翻印或再翻印。1947年3月，上海希望书店据延安版重印，仍分上中两册，易名《中国历史简明教程》，著者署名“范文澜”。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出版合编一册，共766页，8月再版。1948年4月，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主持下对延安版校订一次，对个别问题和词句略有改动。订正本由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9月出版，布面精装，上下两册，并加了“再版说明”，首附范文

澜《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和《论正统》两文。1949年9月，北京新华书店重印订正本，改为平装上中下三册。1953年至1965年，范文澜对《简编》做大幅度改写，出版四册《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写至隋唐五代，约百万言。1978年再版改题为《中国通史》，以示与旧本不同。范文澜替《简编》作过两次修订，即订正本和修订本，订正本在目录和内容上略有微调，而修订本在观点和内容上与旧本变化甚大，可谓重写。下文将以延安版为分析中心，参照订正本修改之处，以说明它与当时社会、政治、史学等因素的关联性。

《简编》的叙述结构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是经济基础，在它上面建立起政治、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等上层建筑。《简编》对生产力和阶级关系着墨甚多，这一特点在章节设置上的表现最为明显^③。对各个朝代的兴亡衰败，大多先讲经济，后讲政治和文化，尽可能揭示二者关系。但必须承认，《简编》并没有处理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络，多数情况下犹如两张皮，毫不相干。第二，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从原始共产社会，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编》需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出适应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社会历史阶段，并用具体史料描画出各个阶段状况，从而证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其一般性^④。《简编》对中国历史阶段排列次序为：（1）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夏以前；（2）奴隶社会——夏商；（3）封建社会——西周至

①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303页。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③ 如第1编第2章“夏商”，第3节“商代的生产方式”→第4节“商代的制度与文化”；第3章“西周”，第1节“周初生产方式”→第2节“周怎样灭殷”→第3节“周初大封建”→第4节“社会阶层的分化”→第5节“种族间斗争及西周灭亡”；第2编第5章“南朝”，第1节“南朝的经济状况”→第2节“土族制度”→第3节“南朝五朝的兴亡”→第4节“南朝文化的发展”。

④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

鸦片战争；（4）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以后。在每个社会历史阶段中，配合各个朝代，尤其在封建社会，按照社会发展及政治发展状况，赋予每个朝代以一个显著特点，如秦朝是“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两汉是“对外发展时代”，三国是“内战时代”，等等。这样描述中国历史，意在表明“中国历史同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也就是说，依照历史一般的发展规律”^①，前途是已知的、必然的，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打破一切民粹的国情论者的谬误观点”^②。国情论者强调国史的特殊性，不论国民党学者还是传统派史学家如柳诒徵、钱穆、缪凤林等，他们维护既存的政治体制，肯定传统历史之内在延续的一面，反对任何颠覆传统国史脉络的做法。譬如，对于历代的农民暴动，沿袭传统观点，视之为“流寇”。国共两党对国史不同的理解，其本质乃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道路的不同选择，反过来，对未来的不同期待亦影响人们对过去的认识。第三，自原始社会崩溃以后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加上一定条件下与阶级斗争结合着的民族斗争）的历史，“人民与统治阶级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③。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正如范文澜所说“整部历史只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而联合也是为了斗争。”^④《简编》全书用阶级斗争及民族斗争来说明事实、解释历史。在阶级社会里，少数统治阶级用血腥手段剥削被统治阶级，挥霍享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于这些残暴肮脏的事实，过去中国历史著作不是把它们隐蔽了，便是将它们美化了，而《简编》却以锋利与痛恨的词句，选取生动趣味的故事，赤裸裸地暴露统治阶级的罪行。然而，对于被统治阶级，则以悲天悯人的笔调，描画他们的苦状，为农民暴动辩护，“封建统治阶级写的历史，一定是为帝王、官僚、地主阶级利益服务，而对人民大众的事实则极诬蔑歪曲之能事；人民大众写的历史，则和这相反，它一定是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而对帝王、官僚、地主的穷凶极恶，则是笔下从不留情的”。因此，统治阶级撰写的历史，“关于统治阶级的罪恶和人民大众善良的记

载，一定是可靠的、真实的”，相反的，“关于颂扬统治阶级和诬蔑人民大众的记载，一定是不可靠的、不真实的，即便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不能轻易相信的”。^⑤同据史书记载，讲统治阶级之恶者为事实可信，而说被统治者之恶者则为不可信，充分反映了《简编》的阶级立场。《简编》颠覆此前历代官方史书“成王败寇”的观点，把劳动人民作为进步、光明、正义的历史叙事主体，而统治阶级则作为反动、黑暗、邪恶的陪衬存在，其背后的政治诉求则是为中共所领导的政治力量从历史上提供事实（历代农民起义），以说明其存在的正当性，进而为中共所推行的武装革命寻找合法性依据，这对中共而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之，范文澜虽承认《简编》有很多不足，但很自豪地说“它比起旧的以封建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来写的历史书，却是本质上不同，许多写法在旧类型的历史里从来没有过。”^⑥

《简编》叙述语言独特，可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大量运用情感色彩强烈的词汇^⑦。现

- ①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第12页。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通史简编》新知版据延安版翻印，然目前延安版已不易觅见，故本文所引延安版文字，皆用新知版代替，下文简称“《简编》新知版”。
- ② 金灿然 《〈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 ③ 《简编》新知版，第49页。
- ④ 《简编》新知版，第764页。
- ⑤ 丁易 《端正读史立场》，《进步青年》1949年第4期。
- ⑥ 范文澜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 ⑦ 《简编》为了达到政治动员的效果，一方面对统治阶级（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加以妖魔化，大量采用“奢侈”“淫乐”“腐化”“卑鄙”“可耻”“残酷”“腐朽”“没落”“凶暴”“残暴”“残忍”“贪暴”“放荡”“腐败”“欺骗”“浩劫”“罪恶”“压迫”“贪欲”“苟安”“害民”“剥削”“镇压”“侵略”“榨取”“压榨”“虐待”“残杀”“专制”“崩溃”“溃灭”等修辞，把统治者完全形塑成黑暗人物；另一方面对被统治阶级（奴隶、平民、穷人、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则频繁使用“痛苦”“穷苦”“水深火热”“无数血汗”“饥寒交迫”“穷困无聊”“痛苦非常”“惨痛”“灾难”“斗争”“摧毁”“破产”“流亡”“牛马生活”等词，把他们描绘成付出极大劳动却承受最大的痛苦和不幸的阶层，形成鲜明的二元对立格局。

代史学专业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专业史家在表述之时被要求尽可能克制情感,冷酷而真实。学院派历史著作大多如此,一般民众对这种冷冰冰的文字难以引起兴趣,故而限制了受众面。不过,中共史家似不受学院派清规戒律的约束,没有包袱,以笔为枪,用火辣文字酣畅淋漓地书写历史。《简编》的叙述范式是统治者极恶、被统治者极苦,前后对比,用反差巨大的词语渲染二者之对立不可调和。《简编》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用充沛的情感宣泄着对统治阶级的憎恨以及对被统治阶级的同情、怜悯、惋惜,易激活一般读者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情感。其二,频繁使用绝对性判断。《简编》常用语气决绝的词汇(如最、总是、势必、一向、必然、到处、必须、始终、无例外、不可避免等),以增强论述气势。它所作出的判断坚定有力、不容置疑,具有排他性和独断论意味,语言风格与学院派史家主张“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克制谨慎态度截然不同。其三,叙述中嵌入大量政治导向性文字^①,暗示暴力革命是正当的,鼓励被压迫者行动起来推翻压迫者。总之,《简编》字里行间蕴含“血气”,涌动着作者强烈的愿望、意志和情绪,对此后中共史学的影响可谓深远。

《简编》的叙事有四方面值得注意。第一,《简编》第一编在左派史家内部分歧甚大,围绕两方面的问题,即关于殷代的社会性质和孔墨评价。前者发生在《简编》编写组成员之间,后者则以郭沫若为主,对延安史家提出不同意见。1940年初,范文澜来延安,同年5月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不同意郭沫若“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而接受吴玉章“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意见^②。《简编》坚持“西周封建说”,初稿在延安《中国文化》陆续发表了前三章。关于殷代社会性质问题,尹达与《简编》其他编者范文澜、谢华、叶蠡生的观点不同,并在《中国文化》上反复辩论。1943年尹达出版《中国原始社会》,仍对《简编》持批评态度“吕振羽、谢华两先生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作者所得到的结论,是和具体事实有相当出入

的……我通读谢华先生的《略论殷代奴隶制度》和《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感觉到那里还没有充分且尽量地运用这部分极可贵重的史料。我以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缺陷。”^③

在范文澜来延安之前,陈伯达为响应毛泽东提出要系统研究从孔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1939年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先秦诸子思想作出系列论述,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有些稿子甚至事先经毛泽东的修改。如毛泽东曾就《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指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④《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则经毛泽东审读,1939年2月1日致信陈伯达说:“《墨子的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⑤陈伯达认为墨子所代表的是“农与工肆之人”,“怀抱有关于解放人类的极高尚的理想和极优美的志操”,将墨子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相联系,热情赞美墨子^⑥。陈伯达对墨子的评价脱胎于毛泽东。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指出“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⑦在延安,墨子地位之所

① 如“全国人民,被暴政胁迫作皇帝一人的牺牲,只有起义反抗,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简编》新知版,第100页)、“被压迫的不平人与不公平的不平人,并存在一个社会里,不是这个不平人杀那个不平人,就是那个不平人杀这个不平人”(《简编》新知版,第495页)。

②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1940年第1卷第3期。

③ 尹达《中国原始社会》,作者出版社,1943年,第185—18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著名的朴素辩证唯物论者,曾提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的著名辩证法命题。

⑥ 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解放》第104期,1940年4月20日。

⑦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第382页。

以如此崇高，正因为中共把墨子视为自己行动的古代理行者，并以继承和发扬墨子精神者自居。《老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接受郭沫若“老子是孔子之师”，批评老子哲学是“破落贵族的代表者”，“当他梦想复归自己过去生活的方面，当他梦想固定自己过去生活的方面，老子在哲学上就表现了其反动的观点”^①。

陈伯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的普遍思想，所以被《简编》大体接受。关于孔子，《简编》认为“中国是长期的封建社会，所以孔子学说的影响也是长期的。他是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教育方面的成功比政治要大得多……他那种繁富的学说，在一定的批判之下，加以选择继承发扬，是非常必需的。至于失去时代意义的理论，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最喜欢拿来利用，企图阻挠新兴的力量，企图挽救崩溃的危局。”反面的批评则是影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包括沦陷区伪政权）鼓吹孔孟之道，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为其政治行动开路，恰如《简编》所言：“统治阶级不从改善政治着手，却一味大尊圣人，正是说明自己政权的动摇和危险。”关于墨子，范文澜主张“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墨家的政治目标，要改善人民生活，每个人都得工作，都得饱食暖衣，更进而得富裕的生活。所以一方面反对少数人的剥削浪费，一方面注重农业和工业。《墨经》里保存很多研究自然科学的材料，墨子本人就是一个很技巧的工人。那时候如果墨家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也许中国社会要提前改变它的性质。不过墨子受时代的限制，当然不能有什么成就。他把人民公意，幻化成天和鬼神，想借天鬼的名义去说服王公大人，但是王公大人决不会听从没有力气的空论，放弃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能扑灭墨家，但是农民工人依时代发展的革命力量，却永远不能扑灭。”至于老子，《简编》与陈伯达有异，认为老子晚出，处于战国后半期。《简编》对老子的批判比陈伯达更为激烈“李耳又是个大阴谋家，他以为处世的方法，最好是装做卑弱无能的样子，等到抓住机会，自己不费力气占便宜。所以他的态度，是

冷酷的、狡诈的、没有温情的。和他同道的杨朱，甚至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多么可耻的个人主义！”^②

《简编》虽然包含了范文澜个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但在延安的特殊时期里，学术研究要服从政治战略的安排，正如范文澜所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到脱离现实斗争的学问里面去游戏，他研究古史、古哲学或个别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今天的斗争，所以任何工作都该分个中外，又都不脱离古今，而今总是重心点所在。”^③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凡是敌对力量所鼓吹的，中共都应加以批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④这一点反映在史学领域，国民党学者推崇孔子，鼓吹新儒学、新理学，而中共学者则多贬孔崇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墨学加以研究，从而对抗‘新儒学’、‘新理学’之类乌烟瘴气的东西”，“在封建法西斯统治日益加强的那个环境里，在墨学研究的形式下讲马克思主义，也会隐蔽一些”^⑤。所以，中共反孔主要是因国民党崇孔，并非孔子有什么问题。同样，中共崇墨也是为了借墨学宣传共产主义理想，关心的重点并不在墨子本身。

郭沫若在公开场合对《简编》总体上是肯定的。1945年8月，他在莫斯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发表演讲时特别强调《简编》和翦伯赞《中国史纲》的发表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大事。他评价《简编》“不仅在于它把中国历史系统化，而且在于写得非常的通俗……它指出了许多最现实的地方。这本书的目的是在使广大民众——工人、农民、兵士——能够认识中

① 陈伯达《老子的哲学思想》，《解放》第63—64期合刊，1939年2月16日。

② 《简编》新知版，第83、86、87、89页。

③ 范文澜《古今中外法浅释》，《解放日报》1942年9月3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3页。

⑤ 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舒芜口述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国的历史。这本书和中国一切科学著作所固有的经院主义完全无缘的”^①。但关于殷代社会性质及对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他与《简编》的差距甚大。众所周知，郭沫若主张“西周奴隶说”，《简编》则主“西周封建说”。关于先秦诸子思想的认识，郭沫若《十批判书》崇孔贬墨，主张孔子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而“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皈命，像他那样满嘴的王公大人，一脑袋的鬼神上帝，极端专制、极端保守的宗教思想家，我真不知道何以竟能成为了‘工农革命的代表’！”^②有学者推测，郭沫若看到《简编》，不满于其中有关先秦诸子的评价，于是1943年8月才写《墨子的思想》^③。然而，从郭沫若至1945年在莫斯科演讲时尚不十分清楚《简编》编者状况来看，此前他并没有见过原书，充其量只见到1944年连载于重庆杂志《群众》的《简编》前七章，故1943年郭沫若撰文时尚无缘得见《简编》^④，他心目中的辩难目标当另有所指。郭沫若说：“但要说墨子是奴隶解放者，是农工革命的先驱，是古代的鲍尔塞维克，虽然明显地不是出于‘偏恶’，然而只是把黑脸张飞涂成了红脸关羽，不仅依然在涂着脸谱，而且涂错了脸谱……但我们如果不认定这个限度而要说墨子是‘最民主’，是‘鲍尔塞维克’，那却是中饱了二千多年的历史。”^⑤只有陈伯达才大胆发挥墨子思想，附会墨子哲学中包含“原始自发的唯物史观”，“表现了某种原始形式的民主思想”，并衍生到共产主义者。因之，郭沫若的预设辩论对手应是陈伯达，而不是范文澜。到了1944年，郭沫若应看过《群众》上的《简编》第一编，所以1945年他才说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见解，他与“现代历史学家和侯外庐、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见解有实质的区别”^⑥。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简编》强调，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这是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看法，

中共史家多能接受，《简编》也贯彻这一观点。同时，《简编》突出残酷的民族斗争及落后民族统治下对先进民族生产力的破坏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对这一问题，从社会史大论战以来就众说纷纭，中共史家内部亦存分歧。1939年日本秋泽修二出版《支那社会构成》，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要打破停滞，中国内部没有力量，需要借助外力，五胡乱华的外族入侵促进了唐之后的发展。外族入侵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日本侵华，把那些为中国社会停滞性的政治支柱——军阀，从中国广大的区域清扫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停滞性最后才能得以克服，与前进的自立日本结合，拓开其真正自立的道路。^⑦此谬论居然被一些中国学者承袭，如左派学者向林冰（赵纪彬）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便持此论。围绕秋泽修二之类的观点，中共学者吕振羽、华岗等展开严厉批判。《简编》对此有所回应，它对中国历史上的外族

① 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306页。

② 郭沫若《墨子的思想》，《群众》1943年第8卷第15期。

③ 戚学民《再论〈十批判书〉的撰著动机与论学宗旨》，《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勇《同道异趣：郭沫若和范文澜的先秦诸子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④ 当时不仅郭沫若未见到《简编》，胡绳也没直接读过。胡绳《近五年间中国历史研究的成绩》（《新文化》1946年第2卷第5期）一文提到《简编》，误认《简编》中册出版于1943年，从文意中能发现他也没见过延安版，是通过间接渠道了解。像郭沫若、胡绳这批中共史家在大后方最初都没机会直接读到《简编》，说明国统区对中共出版物管制相当严格。

⑤ 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7年，第113—114页。

⑥ 郭沫若《战时中国历史研究》，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309页。40年代初，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皆在重庆，过往密切。据侯外庐晚年回忆“一九四七年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前的几年间，关于古史分期问题，我心目中辩难的主要实力目标是翦伯赞。”（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40页。）足见重庆左派史家群体对《简编》所知有限，也没有把它作为辩论对象。

⑦ 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杂志》1940年孙中山先生逝世15周年纪念特刊。

更多从破坏角度立论^①，即凡是异族统治时期，皆对中国社会产生严重破坏，社会停滞不前，与此相反，凡是汉族统治时期，都视为封建社会发展时期，如两汉是“对外发展时代”，隋唐是“封建经济发展时代”，北宋和明代是“封建经济复兴时代”。外族只能一时统治汉族，后者最终总能战胜前者。此种叙事安排显然与抗战语境有关。

第三，“士”被边缘化处理。“士”（知识分子）被《简编》列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与人民是对立的，在国史脉络中被设置为负面存在。范文澜强调士不仅要求优裕生活，看不起劳动食力，而且多数没有人格，仅为谋富贵。写到东汉党锢之祸，对儒生表现得很不屑。朱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理学家，可是在范文澜的笔下，可谓“劣迹”斑斑，其圣贤模样是经长期修饰隐讳的结果。范文澜在国史叙述中对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处理，与同时代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0年）凸显士的核心地位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或批判参考过后者^②。《简编》瓦解了钱穆精心建构的士人政治的认同基础，将多数知识精英在国史脉络中安置于附属被动的地位，而积极复活底层民众的历史记忆，为后者提供认同说明，指示他们政治行为的方向。此外，《简编》似有意与钱著立异，丑化士的形象，或旨在影射当时知识分子向蒋介石政权献媚和少许不顾民族气节沦为汉奸的情况。

第四，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简编》最初是为了延安干部补习之用，且正处抗战、国共斗争日益加剧时期，所以内容侧重“政治正确”和军事斗争，以提高党政军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斗争策略。因之，《简编》写政治军事者多，相对写文化者少^③，表现在三方面。其一，详述历代抵抗外族统治的斗争，歌颂团结抗战，谴责主和投降。其二，着重分析王朝灭亡之因，强调系统统治者对内残暴对外侵略所致，跟农民起义没有关系^④，虽有意将观点隐藏在历史叙述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特意解释自己的观点的地方”，但事实上包含着大量的因果解释，“证明”“可见”“因而”“因此”“所以”“于是”“原因”“说明”等词频繁出现，概括性判断随

处可见^⑤，“从历史的分析中，执行了现实的变革任务”^⑥。其三，农民战争是叙事重点。关于历代农民战争的失败，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权威表述“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战争与农民暴动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如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能够正确领导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与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⑦这一解释被《简编》不厌其烦地加以反复说明，意在提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农民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暗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简编》完成于抗战时期，许多文字表述与

- ① 如两晋时代，“十六国长期混乱，中国社会受极大的破坏。野蛮落后种族的流入，使华族经济文化不仅停滞而且向后骤退”（《简编》新知版，第172页）；宋金时期，“黄河流域在异族长期统治下，农业遭受空前的破坏（主要是括田），工业商业也极端衰落，黄河以南淮水、长江以北广大肥沃地区，变成一望荒凉的边疆战场，真是不可计数的大损失”（《简编》新知版，第437页）；异族统治下封建经济停滞时代（元），“蒙古族统治中国，给与中国社会无比的灾害”（《简编》新知版，第478页）；关于清代，“如果没有野蛮的满族侵入中国，明工业可能有巨大的发展，也许同欧洲一样，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简编》新知版，第612页）。
- ② 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简编》编写组成员确实有可能参考过钱穆《国史大纲》，但左派学者基于批判立场，至于是否对后者有所取材，尚没有确凿证据。
- ③ 白寿彝《评〈中国通史简编〉》，《文讯》1947年第7卷第3期。
- ④ 如讲明亡原因在于不断对外侵略，“明初侵略的成果，不仅陆续失去，而且招致严重的边患，人力财力，大量耗损，造成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参见《简编》新知版，第558页。
- ⑤ 如“南北两朝长期战争，谁的政治较好，谁的内部比较统一团结，谁就在军事上获得胜利。北方依靠兵多马多，南方依靠长江天险，这只是不甚重要的条件。决胜败的主要条件，还是在于谁的政治较好和谁的内部较能统一团结”，“满族战胜汉族，统治中国的原因，主要由于汉族人民不能齐心协力，联合反抗敌人”。参见《简编》新知版，第225、626页。
- ⑥ 时考文《〈中国通史简编〉评介》，《大公报》（上海）1947年7月20日。
- ⑦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1940年第4期。

这一语境相关，然时局瞬息万变，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对抗，因此1948年订正本对某些历史叙事有所调整，以合用于中共彼时的政治诉求：

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国、建立统一的新中国。延安版与订正本不同之处，首先表现在章节名称的改动（见下表）。

延安版	订正本
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底成立	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侵略	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成立后对外扩张
封建经济的发展	封建制度社会螺旋式的继续发展
封建经济发展时代	封建制度发展时代
封建经济复兴时代	国内统一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时代
南北分裂与封建经济南盛北衰时代	外族侵入北方南北分裂时代
异族统治下封建经济停滞时代	外族侵占全国社会衰敝时代
封建经济复兴时代	封建制度更高发展时代
严格闭关封建经济停滞时代	外族统治、严格闭关、社会停滞、西洋资本主义侵入时代

范文澜似欲通过章节名的改动表达三点想法：其一，强化通史性质，原先框架设计突出经济基础的作用，应受唯物史观或国际左派中国史著作的影响，在历史分期上凸显“经济”，容易被看成是社会经济史，弱化了通史性质，所以订正本把“封建经济”都改为“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或“民族国家”；其二，外族入侵对中国的破坏不仅在“经济”层面，所以订正本将“经济停滞”改为“社会衰敝”“社会停滞”，说明破坏是全方位的；其三，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三千年封建社会定性为“发展迟缓甚至停滞”，易被外人利用，成为攻击中国的口实，订正本采用“螺旋式的继续”，表述更具弹性，能被多数人接受。

订正本的修改，既有学术层面的考虑，也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就学术面而言，订正本表述从武断、极端趋于正反兼顾、进退并守。订正本对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人的思想都有所补充。例如，延安版说墨子“代表下层社会农工奴隶要求政治解放”^①，订正本把“政治解放”改为“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②，不以今例古。延安版对老子是全盘否定，完全反动，一无是处，被描述为黑暗人物，订正本则对老子有所肯定^③。延安版描述“王莽那样行为怪诞，

历史上是罕见的。他似乎是个神经病者，又似乎是个巫师，同时还是个博学好古的儒者……不能解决当时的根本问题，反而促成了农民起义”^④，如此注重“怪诞”方面，忽略阶级关系分析，这种提法解释力不够。订正本故而删去“王莽那样行为怪诞”以下40余字，又把末句改为：王莽变法“不能解决当时的根本问题，却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农民起义成熟了，贵族地主也要参加这个起义。王莽变成了独夫，企图解决问题的王莽，成为被问题解决的王莽”^⑤。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分析王莽变法及其失败原因，就唯物史观角度来说是比较恰当的^⑥。延安版讲述北宋经济过程忽略了农业，订正本强调“在北宋中叶以前，一般的经济情况仍然在发展过程中”^⑦，并添加了“农业”一项，说明北宋经济发展的原因与水利、垦荒、农业技术等发展的具体情况。

延安版影射现实之处不少，如“这是破坏

① 《简编》新知版，第86页。

② 《简编》订正本，第158页。

③ 《简编》订正本，第163—165页。

④ 《简编》新知版，第122—123页。

⑤ 《简编》订正本，第219页。

⑥ 荣孟源《〈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种版本》，《人民日报》1950年7月26日。

⑦ 《简编》订正本，第664页。

蜀吴合作，信任小人，杀害贤良，虐待民众的应有结局，也是对内凶暴，一定对外屈服的确切证明”，范文澜本意是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李自成部将李过与南明朝廷合作，接受封侯，又仍称李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延安版认为李过“在反抗满族的大义下，不惜接受明小朝廷爵号，藉求协力合作的效果，在领导农民起义，推倒明朝统治的意义上，必需保持独立精神，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立场”^①。李过行为隐喻中共为抗日与国民党合作，南明隐喻国民党政权。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合作破裂，此类影射文字就成了“无的放矢”，不合时宜，被订正本删除。

抗战胜利前夕，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20日至22日连载《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重视，并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文件来阅读。当时范文澜正在延安，对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当是清楚的，也了解中共中央的态度。1948年订正本讲述黄巢起义失败原因，故特添加一段文字“但是他当了皇帝建立政权以后，人民不得耕种他不管，人民饥寒他不管，士兵们吃树皮他也不管；他却模仿地主阶级的腐化生活，他的部下也都去做官、夸功、享乐、淫乱，于是他们脱离了农民群众。黄巢被地主生活腐蚀了，可是他又大量屠杀读书识字人和投降的官吏，朱温叛变，旧官僚地主和由农民领袖新变成的官僚地主，都跟随朱温叛变走了。黄巢失去农民的拥护，而又被地主阶级抛弃，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②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用意，在于告诫中共领导干部不能脱离群众，反对骄傲。这是范文澜添加上述文字的政治背景。然而，订正本有关李自成的论述，除删除末句影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字外，并未作进一步改动。如此不同寻常的处理，表明范文澜显然有意淡化《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对于《简编》的写作，范文澜后来检讨：“我对我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不满意的，早就想修改，但总没有机会……《通史简编》有很多缺点和错误，我要写一篇‘自我检讨’，

希望发表出来，以便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中国通史的‘定本’，同时也希望引起大家的批评，帮助我改正。”他把缺点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有非历史主义观点；二是在叙述方法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如果说后者的不足是因为作者“马列主义修养差得太多，思想上主观性片面性，没有力量来正确地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③，是个人客观能力局限所致，未可深究，然而对于“非历史主义观点”，则是作者有意为之。范文澜承认为了达到反封建目的，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以及借古说今，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作者如此书写历史，并不是认识上存在盲点，而是为了配合现实政治斗争，出于一时政治策略的需要。这种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革命意义和积极作用。革命成功之后，《简编》原先预设的政治目标不存在了，自然需要适应新时代政治导向重新改写。就此意义而言，《简编》永无定本，需与时俱进，不断修订。

三、内外反响

《简编》可谓延安史学的一面旗帜，在中共史学界反响强烈。延安版问世不久，金灿然撰文予以热情赞扬“《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向上打下了一个基石。它是用新的方法整理中国历史的一个宝贵的成果。”^④《简编》延安版和订正本在解放区多有翻印，数量可观，几乎成为中共对中国历史的标准论述，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非常有影响。1949年前后，中共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文化水平，组织很多地方干部学习《简编》，其作用或不能低估。如有读者引用《简编》对王莽的评价，批评辛安亭《中国历史讲

① 《简编》新知版，第143、609—610页。

② 《简编》订正本，第579页。

③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2期。

④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266页。

话》(延安新华书店,1942年)对王莽论述之失^①。更有人在观戏之余,以《简编》作为依据撰写评论^②。许多学校把《简编》作为历史教材使用^③。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将《简编》节录成《高级中学中国历史》上下册,作为高中历史课本。《初中中国历史课本》是《简编》的提要,《高小历史课本》前两册可以说是《简编》“缩得最紧的缩本”。这套历史教材虽受到一些教员的批评,但“比旧历史教材总好得多,因为它究竟是企图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写的,它究竟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一些真实情况”^④。1950年,柴德赓提出用新的观点方法写一部中国通史,是目前一件极迫切需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很困难的工作,像这样的通史直到今天还只有范文澜《简编》和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在现阶段确是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⑤。1961年,吴晗向青年推荐读《简编》,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编写的一部较好的通史”^⑥。许多学生对《简编》印象深刻,据50年代初的南开中学学生回忆“当时最流行的历史书是范文澜先生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我先借后买了这本书,读得几乎着了迷。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要写历史,就得仿照范先生的写法,大量占有历史资料,经过融会贯通,再用自己独具特色的语言叙述出来,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⑦《简编》诸版成为后来编写各种国史教材的“母本”,借助各种管道,层层渗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产生了无远弗届的影响。

国统区和海外又如何评论《简编》?延安版上册出版不久,就流传至重庆,引起国民政府注意。1942年1月12日,重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向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公函称:“顷据检获新华书店印行之《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一书,内容似有阶级意识色彩,是否准其发行,相应检同原件,函请查照,赐予审查见复,并将原件发还,以凭核办为荷。”2月9日,国民党中央图审会回复审查意见为“经查该书内容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足以淆惑听闻,

动摇青年信念,触犯审查标准,应即予以查禁。”^⑧当时国民党采取冷处理,没有像后来对1947年新知版那样大动干戈,《简编》以及查禁事件反而在社会上并未引起震荡。

《简编》在国统区公开流通渠道受阻,于是改为其他途径,在重庆《群众》周刊分期连载。为躲避审查,易名《中国历史讲座》,作者署名“尹启民”^⑨,连载于《群众》1944年第9卷第10期至16期^⑩,发表了《简编》第一编和第二编第一章,共七章,最后又被国民党中央图审会以“歪曲历史,有鼓吹阶级斗争之嫌”的罪名禁止发表^⑪。40年代初,左派学人曾试图在

① 燕庐《对〈中国历史讲话〉再提几点意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27日。

② 晏甬《谈〈张果老种瓜〉》,《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纪念刊》,1954年,第253页。

③ 胡华《热爱党史坚持阵地》,浙江日报编辑部《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9页;《钱念文史论集》,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④ 《敬答各方面对于教科书的批评》,《人民日报》1951年2月18日。

⑤ 柴德赓《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50年9月3日。

⑥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讨论》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160页。

⑦ 《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九十五周年纪念专刊》,1999年,第151页。

⑧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28—630页。

⑨ “尹启民”不是专指《中国通史简编》编者之一尹达的化名,而是编者集体笔名,可能是“隐其名”的谐音。参见林甘泉《从“私淑弟子”到得力助手——论郭沫若与尹达》,《郭沫若学刊》2000年第1期。

⑩ 蔡美彪曾说延安版《简编》出版后,“在国统区,这部书也很流行。抗战时重庆的《新华日报》连载了这部书。当时没署范老的名字,署的是笔名……后来这部书在国统区也公开发行了(是新华书店印的)”。参见蔡美彪《学林旧事》,中华书局,2012年,第250—251页。蔡美彪在其他文章中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谓延安版连载于重庆《新华日报》之说,查无实据,当为蔡美彪误记,应系《群众》周刊,在国统区翻印的也不是新华书店,延安版最初在国统区并不流行。蔡美彪曾是范文澜的助手,故他的说法在学术界流传极广,以讹传讹,误记大有成为事实之势。

⑪ 《重庆市志》(11),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桂林重印《简编》，“用稿纸重抄送审，但被扣留，没能印成”^①，可见彼时国民党对中共出版物管制之严。

延安版虽遭遇查禁，但大后方史学界对《简编》并非一无所知。1944年6月，报人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采访过范文澜和吕振羽，并在《延安一月》中对他们的史学研究有所评论“我们知道延安版的中国史也完全改变了观点。关于古代史，即在延安学者之中也还是各执一说，未有结论。中古以下的历史，则大部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而改编。倘说中国的旧史是依着‘成王败寇’的观点而写的，则延安版的国史恰取着相反的观点。凡是旧史上的‘寇’，差不多都翻身而成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英雄了。因为这样，所以越写到近代就越难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节，正集合许多专家来研究。”^②《延安一月》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客观上向国统区传播了延安史学的主张。1945年4月22日，范文澜的北大同学金毓黻即读到延安版，并有所评论，只是未说明从何渠道获得《简编》。1945年5月28日，金毓黻日记云“阅《中国通史简编》汉代一段。访傅孟真，与同饭市上。”^③金毓黻、傅斯年、范文澜皆曾师从黄侃，有同门之谊，前二人在重庆交往密切，完全可能谈及《简编》。

1945年7月，傅斯年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有过交谈。在几天的访问中，他见到了昔日史语所的同事尹达。7月2日上午，傅斯年访问范文澜。^④此前，1944年10月3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闻彼处有新刊中国史数种，希为弟致之，或竟向林、范诸人索取可乎？”^⑤然傅斯年是否为陈寅恪带回《简编》，尚不得而知。据蔡美彪回忆，傅斯年从延安回来后到处讲《简编》，说范文澜在延安那样的条件下，在窑洞里还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实在很了不起，国统区的条件远胜于延安，却没有人能写出这样一部著作^⑥。笔者以为此说或可信。傅斯年一向对中共史学有防范之心，时人也拿《简编》质问史语所为何不能贡献一部可与之媲美的中国通史。据彼时的语境，

傅斯年完全有可能说出这些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同《简编》的史学观念，更算不上是“赞誉之词”^⑦。

《简编》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始于1947年新知版的发行，“各方面迭有批评，散见报章杂志，足征该书已引起史学界深切之注意”^⑧。从1947年6月开始，上海《申报》《大公报》在醒目位置刊登出书特价预约广告，约750余字，对此书的目的、取材、内容、范围、章节、编者做了简介。内政部或通过报纸广告获悉《简编》出版动态，在新知版出版之前，即向各省发布查禁令^⑨。7月新知版上市，在勒口有一段文字“人类底历史就是人类自己发展底过程。我们看到古人兴衰成败的各种画图，就可以了解他发展的规律，并且得到许多经验和教训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针。如果不能利用前人心思才力底成果，不但不能发扬光大已有的文明，甚至往往重蹈覆辙，陷入不能自拔的泥坑而自取灭亡。因此，我们要应付现在复杂的环境，明白将来发展的规律，就不仅要精通现在

① 新华书店总店编辑《书店工作史料》第2辑，新华书店，1982年，第168页。

② 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社，1945年，第146—147页。

③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8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5869、5894页。

④ 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第222、113页。

⑤ 《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36—37页。林即指林伯渠，早年与陈寅恪是留日同学；范指范文澜。

⑥ 蔡美彪《学林旧事》，第250—251页。

⑦ 赵庆云《范文澜与中国通史撰著》，《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⑧ 《文史消息》，《东南日报》1948年2月25日。

⑨ “据报共产党盘踞延安时代，其设立之所谓‘中央研究院’，曾编辑有《中国通史》（或称《中国史纲》）一部，现此书即将以历史研究会名义在上海出版。按，该书内容记载诸多曲解及附会中国历史材料，企图教导一般青年仇视政府，背叛祖国，倾心外向，其违反《出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第三两款之规定，已属显然，应依同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禁止该书之出售与散布，除电上海市府详查办理并分行外，相应电请查照，飭属注意，如有发现，即予依法查禁”。参见《广西省政府公报》总第2210期，1947年8月21日。

的一切的事实，而且要熟悉过去的种种历史底情形。”现在读者对这段文字所欲传达的讯息，大概不会有太多联想，但对那个时代读者而言，应能心领神会。

1947年7月13日、20日，上海《大公报》“出版界”副刊连载署名“时考文”《〈中国通史简编〉评介》，赞誉此书有光辉成就：其一，社会史每一阶段的转折点上，都明白指出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必然性；其二，新制度比旧制度更能适应人民的要求，更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否则，如果在剥削人民、压迫人民上所想出的新花样，本书则绝不名为新制度；其三，本书的主要内容不在于叙述皇帝贵族豪强及士大夫等少数特权人物的言行，而在于分析各时代人民大众的生活境遇。新知版经左派学者策划，前广告后书评，宣传力度大，与整个时代的关怀和渴望相契合，遂引起社会普遍注意。7月1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批判《简编》是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上海《真报》《立报》分别题有《“红色历史学家”范文澜之奇书》^①、《〈中国通史〉禁止出售》短讯^②。10月8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对此发表谈话“近来出版业颇见萧条，但坊间充斥黄色书刊及共党宣传书刊，两种同为麻醉青年之毒物。上海新知书店与读书出版社行共匪宣传书籍尤多……其历史作品更诱惑青年，鄙弃中国历史，仇视中国文化，斩伤民族自信、自尊心，为共匪制造背叛祖国之器材。余愿唤起学术文化界之注意。”^③11月2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搜查新知书店门市部，抄走《简编》七八十部^④。

随后，国民党中宣部组织学者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发表系列文章围攻《简编》。赵乐仙重申《中央日报》社论的观点，指斥《简编》是“亡国主义者”的宣传品^⑤。杜呈祥则说“这本书在戡乱声中出现，自然是文化界的一件极惹人注意的事情。在此书到达南京之后，我抢先买到一本，连续翻阅了月余之久，深深感觉到这本书的出版，仅只是替中共平添了一部宣传品，对史学界和一般读者不但毫无贡献，反有所毒害，是不能不加以批评的。”^⑥

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批判中共史学尤力，《中央周刊》编者说“自以史学权威名世的缪教授连续在本刊发表几篇批评文章后，对于近年来卢布文人所散布的毒素和烟幕，有扫荡澄清之功，本刊已接获不少读者来函对缪教授一致表示钦敬之忱，兹篇批评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尤为力作，一字一弹，无不命中。”缪凤林即以《揭开它的伪装显露它的真相》为题加以批判，认为“这不是一部什么《中国通史简编》，是一册道地的中国共产党的——或者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希维克主义者——大胆的宣传品”^⑦。

杜呈祥、缪凤林指责《简编》为回避沙俄侵华之历史而缺写近代部分，殊不知1946年范文澜已出版《中国近代史》，其中有揭露沙俄侵华之事。1948年陶希圣在一次访谈中论及中共史学，仍持旧说，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中国史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等著作完全为了破坏中国文化，不过是政治斗争的手段，也可说是“强权侵略”的工具。当记者问陶希圣，上述这些书为什么流行很广？他说这是中共史家用了伪装的科学方法，以流

① “前延安‘中央研究院’院长范文澜，著有一部《中国通史》，近在上海大登广告，以‘历史研究会’之名义，即将出版，南京版《中央日报》社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指示该书乃以农民暴动，为共产党作历史之根据，标榜王弥、孙恩、黄巢、王则、方腊、李闯、张献忠一流之残杀行为，引起青年仇视祖国，欢迎外国人入至中原，为汉奸史上空前未有之奇书云”。参见《“红色历史学家”范文澜之奇书》，《真报》1947年7月19日。

② “上海若干书店，出售《中国通史》一书，内政部因查该书为共产党‘中央研究院’所编，内容记载中国史实不正确，违犯《出版法》第廿一条第二第三两款，及第廿八条之规定，今日训令上海市政府予以取缔，禁止书局出售”。参见《〈中国通史〉禁止出售》，《立报》1947年8月13日。

③ 《陶希圣谈话内容》，《申报》1947年10月8日。

④ 《沪新知书店被抄》，《益世报》1947年11月4日。

⑤ 赵乐仙《亡国主义者的论调——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央日报》1947年11月10日。

⑥ 杜呈祥《评范文澜主编〈中国通史简编〉》，《中央周刊》1947年第9卷第45期。

⑦ 缪凤林《揭开它的伪装显露它的真相——评范文澜等〈中国通史简编〉》，《中央周刊》1948年第10卷第5、14期。

俗的唯物史观为外表，青年受了欺骗，喜欢看它，殊不知其内容并没有正式科学方法，也并非正式运用唯物史观，只是荒谬的、混乱的胡说，基本上对中国文化采取完全否定的敌视态度^①。国民党对《简编》所谓“背叛祖国”“卖国亡国”“苏联的藩属”的指控完全无的放矢，皆非《简编》之政治意图——武装革命具有正当性。此种子虚乌有的欲加之罪，无疑想转移国人视线，利用民族感情，抹黑中共，让国人对中共产生厌恶心理。然而，国民党的一系列遏制行动，并没有消除《简编》的影响，反而由于官方权力的介入，借助查禁、搜查书店、陶希圣多次讲话、学者批判，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面，青年“喜欢看它”^②。许多读者原本对《简编》未必有多大兴趣，但国民党对此事的激烈反应刺激了读者想要一睹为快的心理，而这恰恰是中共希望达到的效果。

除了国民党所组织的批判性书评，新知版在国统区学术界的反响也不能小觑。1947年8月19日，白寿彝阅读新知版后写道，“此书在分量上说，是近年史部撰述中的一部大书。在集体写作上说，七个人共同写一本书，也是近年史学界底一种创举。在内容上说，这是一部有强烈的战斗意识书……在写作方法上，这是用立体的写法来写的，和一般之面的，甚而是线的写法不同。在整个形式上，这是一部史书，和一般之‘史论’‘史考’‘史抄’而冒称为‘史’者也不同”，《简编》所悬之目标——“简明扼要，通俗生动的，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显示社会发展法则”，除了“揭露统治阶级罪恶”达到目标，其余都不尽意，尤其第三编，“作者似乎对于史料驾驭的能力不够，对这一大堆更杂乱更繁重的史料尚不能愉快地抓得起来”。他承认“这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东西，但血肉都还嫌不充实，发育得也不平衡”。^③

1947年10月8日，古史研究者丁山在青岛“一口气读毕《通史简编》，再展望中华民族的前途，不禁风雨飘摇，感慨万端！”他所读的也是新知版，评价极高，承认这部通史是夏曾佑之后的第一部成熟之作，“以人民生活为中心，由经济基础论到历代的政治社会问题，这才是

青年们所急需了解的中华人民史”。他自我解嘲说“当此‘积急公民’垄断一切的国计，宰制全国的民生，国家方努力步武资本主义的末路，我们毫无勇气去作革命的动力以创造中国历史的新章回，而闷在屋里，运用个人狭隘的见解来批判范文澜先生所主编的《通史简编》，由新历史学家观之，当然是愚蠢的反动。”^④他的商榷意见主要有：其一，就中国统治阶级出身来检讨秦汉以后的历史，隋唐以前，诚为封建社会，宋元以后，应该改称为官僚集团时代；其二，《简编》详叙每朝末期的“农民大起义”，可以商讨，因为领导起义者不尽是农民，要是从人民立场看，作史者不必表彰那群以暴易暴的野心家，应该多赞颂那能为人民除暴安良的循吏和舍生救世的豪侠之士；其三，《简编》对于历代革命性的破坏写得很详尽，对于建设面事实则不够充实，如西汉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之治，值得颂扬，不能因为他是统治阶级就隐其善而扬其恶；其四，关于民族对外问题，汉武帝伐匈奴、唐太宗灭突厥、明成祖讨伐蒙古等是攻势性防御，不应加以“侵略”罪名；其五，接受郭沫若《孔墨之批判》之论，认为孔子学说是“人民本位”，《简编》说“孔子所谓天命就是君主专制，鬼神就是卿大夫”，这是厚诬孔子。丁山的评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完全是学人间的不同看法，且语气平和，态度善意，具有相当说服力，与后来范文澜自己所检讨的有些错误是一致的。“由于当前现实之思想斗争，以至兵争政争，立场既有不同”，故新知版发行之，赞否之词大异其趣，然从纯学术立场评论《简编》，惟丁山最为平正公允^⑤。

《简编》在英文世界亦有回响。何兹全于

① 《访陶希圣先生》，《中央周刊》1948年第10卷第1期。

② 关于范文澜《简编》之所以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可参见李孝迁《革命与历史：中国左派历史读物》，《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5期。

③ 白寿彝《评〈中国通史简编〉》，《文讯》1947年第7卷第3期。

④ 丁山《〈中国通史简编〉批判》，中国人文研究所，1948年，第26、1—2页。

⑤ 吴天堉《中国通史评介》，《新中国日报》1948年4月19日。

1947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访学霍普金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协助助理教授德范克（John DeFrancis）翻译《简编》^①。德范克之所以会翻译《简编》，或与该学院主持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关，后者曾于1936年访问延安，与左翼人士保持密切联系。1948年1月经英国文化委员会介绍，伦敦大学中国史教授史宾凯（Von de Sprankal）到南开大学任教，讲授小说、文学评论、戏剧、世界史等课程。那时蔡美彪在南开大学读书，他看过《简编》，即以此书作为教材辅导史宾凯学汉语^②。1948年4月，侯外庐在香港用英文为新知版写了一则简讯，发表在美国左翼杂志《太平洋事务》。他肯定抗战结束之后及时再版《简编》是值得庆祝的，提出该书在写作方法上有三方面优点（大体脱胎于前述广告），指出在当时条件下《简编》存在不可避免的不足，如中古、近代部分比古代写得好，对某些古代制度的起源如所有制和长子继承制等没有加以研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学界众说纷纭，或谓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甚至称早期封建社会，《简编》提出“封建社会说”，并未令人信服。^③

1949年留美史家邓嗣禹在美国《远东季刊》发表长文《最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写到中国通史部分，专门评论范文澜《简编》、周谷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等三部左派著作。对于《简编》，邓嗣禹认为范文澜虽作为中共史家之领袖，但他受传统学术训练太深，不会产生很激进的看法，涉及古史部分，他比顾颉刚要保守得多。这本书简明易读，尤其注重平民历史。范文澜企图通过科学发掘的结论来证明中国传说帝王的可信，坚信中国历史应始于黄帝，新石器时代的河南仰韶文化即为黄帝文化，《简编》仅是新瓶装旧酒而已。^④1954年留美女学者杜联喆在《远东季刊》发表书评，参考荣孟源《〈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种版本》一文，介绍《简编》的三种版本。她认为，对很多读者而言，范文澜在中共史学界的地位类似于1932年前苏联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M. N. Pokrovskii）。杜联喆指出，在红色中国，传统文化命运将会如何，美国学者顾立

雅（H. G. Creel）、列文森（J. R. Levenson）、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对此有不同看法。不过她发现1953年修订本《简编》第一编有些不同于延安版和订正本之处，如关于孔子，前两个版本用了约2000字，而修订本则用了5000余字，孔子在修订本获得了适当敬意。中共对这位古代圣人，并没有真正贬低，孔子的很多格言和公式在新社会仍然是有益的。^⑤

四、结 语

自20世纪初“新史学”以降，中国史学界出版多部中国通史作品，唯《简编》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述说中国历史，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中共史家所撰写的各种通史中，《简编》筚路蓝缕，出版最早，为后来者立下了轨式，是代表中共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杆式作品，影响至深且广。此书形成于特定历史时期，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史学方面讯息，是剖析历史知识与社会变迁的绝佳文本。

《简编》在中共党内具有特殊地位，具有很大的政治与文化力量。它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在与其他观点的竞争中具有优势，渐成为主流观点，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延安版在解放区颇有流传，但在国统区受到国民党查禁，影响有限。此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始于1947年新知版，进而波及海外。国统区史学家最初对《简编》赞否不一，但随着中共取得政权，唯物史观席卷史学界，此书诸版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在其他各种历史文本中时常作为标准观点来加以征引，有被“经典化”的趋势，这在中

① 《何兹全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② 蔡美彪《学林旧事》，第251页。

③ Hou Wai-lou,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Vol. 21, No. 3 (Sep., 1948), pp. 301 – 302. 另外，侯外庐主张西周奴隶说。本人的回忆录未提及此书评，相关研究也未曾注意。

④ S. Y. Te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8, No. 2 (Feb., 1949), p. 147.

⑤ Lienche Fang, “Chung-kuo t’ung-shih chien-pie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3, No. 3 (May, 1954), pp. 353 – 356.

共史学中绝无仅有。

《简编》“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这是它与一般学院派著作的最大区别，也是对当时史学界主流强调事实与价值分离取向的一种纠偏，具有积极的一面。《简编》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站在中共立场，颠覆既往旧史“成王败寇”的叙事模式，这不仅在史学史上具有革命意义^①，而且在中共党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历史书写以一时形势为转移，固然能取得暂时的社会效应，但不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史学独立性。《简编》为了时刻保持“政治正确”，不得不反复修改，以致范文澜助手荣孟源说延安版“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不可再用了”^②，而他本人也不满意，谓有必要“从头再来过”^③。作为一部通史，必须关乎当下社会重大问题，这是史学跟现实对话的基础，也是影响一般民众的前提，《简编》在这方面是一个成功典范；但它又理应坚守史学纪律，不能有意背离历史求真的理想，或故意遮蔽历史的另一面，《简编》在这方面又是一个值得后人警醒的案例^④。如何达成时代关怀与历史客观性的统一，确实是对史家智慧的一大考验。

研究者大体可以想象，范文澜在革命年代的延安窑洞里心怀“革命义愤”，奋笔疾书，宣泄着对历史黑暗面的仇恨以及对弱者的无限同情。砸烂旧世界、再造新社会的信念引领着他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简编》。这部极具打破旧秩

序意涵的中国通史，契合 40 年代中国社会的撕裂状态，遂能释放最大程度的革命力量，对一般读者具有不可抵御的魔力，“大众如潮水般泛滥起来”^⑤。然而，中共革命成功后，中共史家从原先的革命者身份转换为专业学者，就必须遵守专业纪律，接受事实检验，所以范文澜的修订本《简编》本着历史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部分恢复统治阶级成员（包括孔子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进入后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简编》已全然脱离当下的社会现实，一般青年读者难以引起共鸣，无法体验前几代读者的阅读感受，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 吴志军）

-
- ①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 532 页。
 - ② 荣孟源 《〈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种版本》，《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26 日。
 - ③ 范文澜 《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1951 年第 4 卷第 2 期。
 - ④ 黎澍 《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人民日报》1985 年 5 月 3 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第 536—537 页。
 - ⑤ 管昕石 《中国史读法》，中华书局，1949 年，第 3 页。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11 月 25 日，“新时期与新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丛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 10 余位专家与会，研讨了该丛书的编写特点和出版价值。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组织编写，靳诺、杨凤城担任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分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外交和执政党的建设等七个专题卷，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化地回顾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光辉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丛书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为主题，以纵向历史回顾和横向核心专题为主要内容，注重历史叙述与理论分析、学术性与通俗性的结合，是新时代高校党史工作者致敬改革开放 40 年的主题丛书。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自今年 7 月出版至今，发行量已逾万套。（耿化敏 李坤睿 供稿）